

# 會通致用，多元適變——論惲敬文章理論之特色

蔡美惠\*

## 摘要

惲敬精研經、史，旁涉諸子，而後折衷六經，其學由博反約。主張「因事立體，順時適用」等文體論，提出「本末條貫」、「理實氣充」、「自然天成」等創作理論，及「調和醇肆」的風格主張。長於辭賦、駢體，尤以古文見稱，風格雄爽精健，不同於桐城派柔澹清婉的文風，有「姚（鼐）、惲（敬）派分」之說，對於陽湖派文風之塑立，具有相當貢獻。本文試由惲敬之文學思想、文體觀念、創作理論、風格主張，以及作用影響等面向，以探索其文章學之特色與價值。

**關鍵詞：**惲敬、陽湖派、文章學、本末條貫、醇肆調和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Comprehension and Practical Use of Essay Theories to Promote Diversity and Adaptability: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n Jing's Essay Theory

Tsai Mei-Hui\*

## Abstract

Yun Jing was a 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jing*) and history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 works of various schools. However, in his later years, he focused his study to that of the Six Classics. He proposed the essay theory of establishing a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applying such a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imes. In addition, he introduced essay creation theories such as continuity between major and minor ideas, solid reason and ample qi, and natural forms. He also put forward the essay style “harmonic mixture of mellow wine.” Yun was skilled in writing *fu* (rhapsodies) and parallel prose and was especially famous for his classic literary style. Differing from the soft and gentle writing style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Yun's writing style was bold and strong. Thus, the schools to which Yao Nai and Yun adhered were said to have diverged. Yun contributed considerably to the sty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Yang Hu School.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Yun's essay theory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literary thought, concepts of literary genres, creation theories, proposed writing style, and effects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Yun Jing, Yang Hu School, essay theory, continuity between major and minor ideas, harmonic mixture of mellow wine (essays)

---

\*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Course Program Cente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 會通致用，多元適變——論惲敬文章理論之特色

蔡美惠

## 一、前言

惲敬（1757-1817），字子居，號簡堂。生於清高宗乾隆 22 年（1757），卒於仁宗嘉慶 22 年（1817），年 61 歲。乾隆 48 年（1783）舉人。以教習官京師，與莊述祖（1750-1816）、張惠言（1761-1802）等友善，切磋學問。歷知富陽、江山二縣，以振興文學為要務，廉名顯著。以卓異拔擢為南昌府同知，改署吳城。為人負氣，矜尚名節。為忌者誣劾，以失察去官。敬少好為駢文，稍長，改治古文辭。中年後，更加研習經訓，博覽縱橫。其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風格雄爽精健，不同於桐城派柔澹清婉之文風，有「姚、惲派分」之說，對於陽湖派文風之塑立，具有相當貢獻，與張惠言同為陽湖派之開創者。

綜觀惲敬文章學之興起，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清代因康、雍、乾盛世，承平日久，至乾隆末年，一般人尚迷戀於盛世迷霧之中，然才短短數年，國勢陡降，時局步入內憂外患，甚至亡國滅種之危急存亡時刻，在此盛衰交移之時局，最能預知時代變動，最早嗅得「殆將有變」預感的文派，即是陽湖派。時代動盪的刺激，促成陽湖派經世致用思想興起，也促成近代思潮之形成，故陽湖派之茁興，與時代之變化息息相關。惲敬為陽湖派創始人之一，經世致用為其重要思想，綜理其文章學形成之動機，則在於「經世致用」的決心，亦即「以文濟世」的文學目標。

常州《公羊》學派之興起與主張，亦為惲敬文章學形成的重要原因。常州《公羊》學派，始於武進莊存與（1719-1788），其時代與戴震（1723-1777）大約同時，正值漢學盛世，莊氏之學不屑考據，要求微言大義，以何休《公羊》學解《春秋》，

與當時漢學家尊崇賈、馬、許、鄭者不同。其後傳侄莊述祖，述祖再傳甥劉逢祿與宋翔鳳，而《公羊》之學始顯。劉氏於《公羊》學之闡發極其用心，對理論多有發明，其弟子中最顯著者，有龔自珍、魏源、凌曙，此後，《公羊》學披靡一時，研究者接踵而起，凌氏之後，傳陳立、戴望、包慎言、王闓運。闓運之下傳廖平，後再傳康有為，再傳譚嗣同、梁啟超、皮錫瑞等，影響晚清學術思潮相當大。惲敬世居陽湖，與莊述祖、劉逢祿（1776-1829）亦有所交遊。惲敬之文學觀，尤其經世致用及變革更新的思想，應有受到常州今文經學影響之處。

追索惲敬文章學之形成，實與常州古文發展關係密切。常州散文之淵源，可追溯至齊、梁時期。齊、梁蕭氏家族對於常州文學之發展，具有開闢功效，尤其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及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對於文學發展深具影響，至於劉勰的《文心雕龍》所論深刻精微，集六朝文論之大成，奠定文論不祧之地位。唐代，有蕭穎士之傳道授業，獎勵後進，推引提攜，更促進常州文學之發展。宋代時期，大儒蘇軾、楊時等都曾寓居於此，對於學術、文學與文風，具有影響。至於明代以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常州文人為主導之東林黨興起，天下文士聞風響附，遙相應和，儼然成為天下清議的重心。明代唐順之（1507-1560），則具奠基之功。唐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主張為文需重「本色」，著重「文章真精神」，對於常州文學影響良深。此後，歷經清初的陳玉璣、董以甯、邵長蘅、蔣汾功、楊椿等人傳承，至於乾隆年間，以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黃景仁、楊倫、呂星垣、徐書受等「毗陵七子」相踵繼，終至惲敬、張惠言、李兆洛、陸繼輅等陽湖派之崛起，此為常州文脈傳衍的主要脈絡。毗陵七子間多所往來，互相酬謝唱和，學友相輔，蔚成常州文壇風氣。陽湖派諸家亦延續此一文化，惲敬身居其中，自然受到常州文壇之滋乳。

惲敬與「毗陵七子」中之洪亮吉（1746-1809）、趙懷玉（1747-1823）交情甚篤。洪氏為文主張經世致用，對於常州致用文學觀之產生，具有引導作用，與惲敬經世致用的主張，有互通之處。趙懷玉論文，重視經世，強調致用；不限門戶，會通古今；師友相輔，學文並重，與惲敬重視致用會通、學文互濟之論，亦有相應之處。惲敬與陽湖派諸家亦多酬唱應答，相與商榷經義、古文，尤以張惠言為最。嘉慶7年（1802），張惠言逝世，惲敬慨然自言：「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並力為之。」

<sup>1</sup>承繼好友張氏「以文濟世」志業，慷慨承擔，惲、張二人相知可知。張惠言為一代經學大師，尤以《易》、《禮》為特長，並且善於會通，能融煉諸學，折衷經典；論文主張學文相濟，並推崇文章經世致用價值，以達到以文濟世之標的。惲、張二人交情深厚，文學思想、主張與創作，亦相互影響。惲敬文章學之形成，受常州文壇影響甚鉅，尤以毗陵七子與陽湖諸家之輔益為最，而「致用」、「會通」實為惲敬文章學理論之特色，本文試依惲敬的文學觀、文體說、創作論、風格說，及作用影響等，以探索其文章學的內涵與價值。

## 二、與時俱進的文學觀

「致用」、「會通」的文學觀，是惲敬最主要的文學思想，其產生緣由，乃受時代動盪之刺激與環境之孕育而來，希冀達到文以濟世之標的，故其文學觀，深具與時俱進之特性。試就「經世致用」、「會通諸學」、「折衷六藝」等面向，說明惲敬文學思想的重心。

### （一）經世致用

惲敬（1757-1817），所居時期為清代中葉，清桐城派姚鼐（1731-1815）同時，為清代「鼎盛乍衰」的時期，亦即由傳統步入近代的過渡期。乾隆末年，清代國勢由極盛轉為衰頹，造成極盛乍衰的主因，則來自政治汙濁不清，官吏貪腐放肆，士人志節日下，經濟亦日益衰頹，相互影響，造成國家衰頹。惲敬對於時局甚為關注，於〈與秦筠谷〉一文對於當時士人投機逢迎、誇詐寅緣成風，反譏笑誠信務實者為「迂」的種種腐敗現象，深深感慨，以為：「今之士大夫，不病其迂，病其常不迂，且以其不迂，排人之迂。此吏治之所以日偷，士大夫之氣節，所以日壞，在有志者，自免之耳。」<sup>2</sup>吏治大害，官吏貪狠，貪瀆聚斂，黨同伐異，傷害風氣，士大夫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志節日下，更助長惡風。政治汙濁，民不聊生，致使內憂頻仍，如黔、湘等地苗變，惲敬關心國家、社會，故於《大雲山房文稿》中，如〈後二僕傳〉、〈紀言〉、〈亡妻陳孺人權厝志〉、〈王盛石記〉等文，

<sup>1</sup>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初月樓古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卷8，頁75上。

<sup>2</sup> 惲敬：〈與秦筠谷〉，《大雲山房文稿·言事》（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11月），卷2，頁207。

輒有記載。可見惲敬對於政治、社會、民生之關懷，與其經世致用的用心。

惲敬經世致用之思想，也可由其對「格物致知」之闡釋看出，惲敬說：

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即要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倪者也。……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事焉，是以《大學》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要其至。<sup>3</sup>

大抵而言，惲敬撇開朱熹、王陽明形而上之論，回復《大學》「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論點上，以為所謂「格物」所格之物，即「天下、國家、身、心、意」諸事物；「致知」所致之知，即為「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著重於生活實踐，亦即撇開形而上繁複虛無的論理，從生活上真實地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事物，真正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之至」。可知惲敬之學術思想，乃由經世致用出發，發揚儒學精深浩瀚的意涵，與具體可行的經世致用效益，對於清代前期「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風氣，無疑是當頭棒喝。學術之目的，在於致用，此為惲敬「通經致用」的意涵，而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惲敬特尊古文為正體，文的內涵是「道」，而此「道」絕非繁複虛無的論理，而是「誠、正、修、齊、治、平」的實踐，經世致用之標的，治學如此，為文亦是如此，故「文以濟世」，文以經世致用，為惲敬重要之文學觀，亦為其文學創作之主要目標。

惲敬精理經訓，博通諸子，精通治術，其中最能表現其經世致用之思想者，首推《三代因革論》。惲氏自言其論之目的，在於「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sup>4</sup>其所欲闡發者，為「聖人治天

<sup>3</sup> 惲敬：〈讀大學〉，《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1，頁112-113。

<sup>4</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一〉，《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4。

下之道」，亦即儒家經世之法。以為「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sup>5</sup>，強調時變境遷，法亦應因時而變，不可拘泥。至於變法的準則，在於「合乎人情之所宜」<sup>6</sup>，符合儒家禮制精神，通權達變，革新致用。若形式、方法、細節，如「質文之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sup>7</sup>，不可死守。惲敬對於田賦、田制、民力、養兵、差役等問題，皆有所用心。如在人民之勞役方面，提出：「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sup>8</sup>，亦即為政持法應當因時制宜，擇其最不擾民之法來施行。並提出改善之建議，以為「民役之宜顧」，然應當「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誠能如此，才能達「官府修」而「閭里寧」，「苛擾之事除」，而「海內皆樂業」的作用。<sup>9</sup>可知《三代因革論》乃運用夏、商、周三代變革此一《公羊》學的觀念，以三代聖賢推行之政治改革為依據，闡述帶有變革意識的儒家經世思想，故經世致用實為惲敬思想之重心。

## （二）鎔鑄諸學

惲敬對當時之治經，不知會通，無法折衷，又無益於用之現象提出針砭：

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疎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修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sup>10</sup>

惲敬基於「會通」、「致用」之觀點，以為當時學者之治經，為學術而學術，不知變通，空言聖賢，卻「疎于察凡庶」，「怯于赴時勢」，且「薄于考通方」，致使所論漸趨狹隘、偏頗，甚至「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

<sup>5</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八〉，《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11。

<sup>6</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一〉，《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4。

<sup>7</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八〉，《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12。

<sup>8</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七〉，《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11。

<sup>9</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七〉，《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11。

<sup>10</sup> 惲敬：〈三代因革論八〉，《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1，頁12。

推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要通者，至不必要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而造成「天下之亂言」。可知實務、致用與會通之重要。

惲敬治學、為文取徑廣博浩瀚，曾言學習古文之法度去取，以為：

敬自能執筆之後，求之於馬、鄭，而去其執；求之於程、朱，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而去其浮；求之於馬、班，而去其肆；求之於教、乘，而去其罔；求之於茵芝、步引，而去其誣；求之於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農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淘汰之，播揚之，揣摩之，釁沐之，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竊有志焉而未逮也。<sup>11</sup>

可知惲敬所學之範疇可謂廣泛，融合漢、宋，會通經、史，取擷子、集，兼容佛、道，涵蓋雅、俗，上至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甚至「求之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且善加擷取利用，「淘汰之，播揚之，揣摩之，釁沐之，得於一是而止」，以達「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境界。惲敬真可謂無所不學，與桐城派取法韓、歐之路徑，不甚相合。可知博學會通，學文相濟，是惲敬文學觀之一大特色。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亦說：「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sup>12</sup>「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sup>12</sup>惲敬所學廣博通透，「研精經訓」，欲以孔子之教救時解弊，故以經文本，折衷六藝。並「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且「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于儒術」，旁覽諸子，折衷儒術，可以廣博其識，亦有利於致用。至於其治學、為文之目的，則在於「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詞，以期至於可用而無弊。」<sup>13</sup>「博其識」，得力於學識恢弘；「昌其辭」，得力於文章能事，如此才能學文互濟，俾利經世致用。至於其學「由博反約」，精研經、史，旁覽百家、

<sup>11</sup> 惲敬：〈上舉主筮凡先生書〉，《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2，頁137。

<sup>12</sup>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初月樓古文鈔》，卷8，頁75上。

<sup>13</sup> 陸繼輅：〈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崇百藥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卷17，頁215上。



文集，而折衷儒術，可見會通致用，為惲敬主要文學思想。

至於在文章寫作上，惲敬則主張鎔鑄辭賦，並重駢散，取徑六朝。陽湖派諸家對於駢、散之辨，主張駢、散並重。張惠言於二十七歲以後，受桐城文友王灼和同鄉前輩錢魯斯的影响，始為古文。後至京師，與惲敬進一步切磋揣摩。從此，惲敬、張惠言由熱衷辭賦、駢體轉向古文創作，可知惲、張二人早年以辭賦、駢體入手，之後才致力於古文，因此辭賦、駢體之理論與創作經驗，對二者仍具深刻影響，故能吸收辭賦、駢體之長處，融合古文之優點，擺脫桐城派「獨尊古文，排斥駢體」之藩籬，使文章之理論與創作，更具會通效果，更能活脫展現。惲敬為文不廢駢體之長，強調文章用典之重要，其說：「凡文之事曰典，典者所以尊古也，若單文無故實，則比于小學諸書。」<sup>14</sup>用典所以尊古，以為佐證，故文章應當善用典故，以免淪於枯瘠而缺乏文飾。惲氏亦重視修辭、文法，以為文章之作法，能參酌《文心雕龍》、《史通》、《文章宗旨》諸書，則可得文法、修辭之法度、規範。<sup>15</sup>可知駢體的作法與技巧，已然融入惲敬的理論與創作中，與古文作法與技巧交相會通，故惲敬實能會通各體之優點，兼重駢、散，取徑六朝。駢、散並重，取徑六朝，為陽湖派重要的主張，亦為其與桐城派基本之差別，惲敬會通辭賦、駢體，對於陽湖派駢、散並重的主張，應具奠基之功。

### （三）折衷六藝

惲敬融會諸學，歸本孔聖，取徑孟子，折衷六藝。惲敬論及孔子之教，則說：「孔子之教，明人倫，定家國天下，雖五大洲各師其師，各弟其弟，豈能在範圍之外哉？」<sup>16</sup>其尊崇孔子之教，深廣博大，且為經世致用之良方。論及孟子之教，則曰：「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為不為，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sup>17</sup>孟子學孔子者，取徑孟子，以孔子為依歸，有利於治經，亦有利於致用。孔、孟之學，講人倫，講仁義，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謂「中且

<sup>14</sup> 惲敬：〈序錄〉，《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目錄》，頁10。

<sup>15</sup> 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7。

<sup>16</sup> 惲敬：〈光孝寺碑銘〉，《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4，頁169。

<sup>17</sup> 惲敬：〈讀孟子二〉，《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1，頁114。

正而得實」，<sup>18</sup>實為經世致用的不二法門。故惲敬以《六經》折衷經學各派學說，以截長補短，救時解弊；以之會通經、史，鍛鍊經世濟民的治術；以之鎔鑄百家眾說，以利於致用；以之會通諸學，以利於創作，以達「文以濟世」的目標。

惲敬會通諸學，折衷六藝，尤以鎔鑄百家，最具特色。惲敬主張諸子百家為「《六經》之支與流裔」，並會通其說，以為：

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縱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惟《詩》之流，復別為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sup>19</sup>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探討諸子百家之源流，提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可知諸子之學說，乃應「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而來，亦即諸子學說之產生，乃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時局動盪不安之刺激而來，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然其目標，皆為解決當時局勢之動盪，如《易經》所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因此「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sup>20</sup>惲敬之說，則同於《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所敘，諸子之說，「亦六藝之所孕。」

諸子之說，既為《六經》所孕，故諸子與《六經》可以相互會通，「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是以「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但若只知「附會六藝，屏絕百家」，則「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sup>21</sup>可知治學、為文，不能不會通諸子

<sup>18</sup> 惲敬：〈金剛經書後一〉，《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2，頁43。

<sup>19</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sup>20</sup> 班固撰，王先謙注：〈藝文志·諸子略敘〉，《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出版社，2013年2月）。

<sup>21</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百家，否則為文命意、取材、結構、布局、筆勢，甚至於抒發情意，皆受限制，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sup>22</sup>欲振興文學，應從取融諸子做起；而欲取融諸子，則應折衷六藝，會通百家，折衷六藝，方有助於增長識見，也才能知所會通、變革。

鎔鑄百家，折衷六藝，有輔益文章的功用，綜觀歷代名家，於百家多有取法，並會通鎔鑄，而能有得。如賈誼得力於名家、縱橫家，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得力於法家、兵家，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得力於儒家、道家、陰陽家，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得力於儒家、法家、名家，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得力於儒家、雜家，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得力於儒家、雜家、詞賦家，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得力於兵家、縱橫家，故「其言縱厲」；蘇子瞻得力於縱橫家、道家、小說家，故「其言逍遙而震動」。<sup>23</sup>可知能參酌諸子之寫作技巧，文章能有所化，而能脫去束縛，革除迂腐，奇正多變，亦可增長智識，亦有利於文章創作。

至於會通之法，曾國藩則提出「脫胎之法」，可為佐證，曾氏說：

退之以揚子雲化《史記》，子厚以《老》、《莊》、《國語》化六朝，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子固以《三禮》化西漢，老蘇以賈長沙、晁家令(錯)化《孟子》、《國策》，東坡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求脫胎之法，即可求變化之法。若拘步一家之文，即能與之並，不能成一家言。朱子之文傑出，尚不免為子固所掩，況其他乎？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老蘇惟《權書》能化，子厚惟辨諸子、記山水能化，子固惟目錄序能化，以其與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sup>24</sup>

曾氏所謂「脫胎之法」，主在學習古文的間架、體勢，亦即所以成文的布局結構，摹擬古人作文之間架，而後文章之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至於其步驟，首先，則先摹擬一家，得其相似後，再摹擬其他家。若能取質性相近者

<sup>22</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4。

<sup>23</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sup>24</sup> 轉引自朱任生：《姚曾論文精要類徵》（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81。

來學習，則接受較容易，體悟較深刻，如韓愈之仿揚雄、柳宗元之仿《國語》、王安石之仿周秦諸子、東坡之仿《莊子》等。如此先摹擬一家，得相似後，再摹擬他家。其次，摹擬數家，經比較、分析、綜合、歸納等思維，自然容易融會貫通，也易於鎔鑄創新。如「退之以揚子雲化《史記》，子厚以《老》、《莊》、《國語》化六朝」，「東坡以《莊子》、《孟子》化《國策》」等即是。故脫胎之法，即可求變化之法，不能只拘步於一家之文，若侷限一家，則無法變化，自不能鎔鑄創新，也就無由創建獨立風格，無法成一家之言。再者，則擴大門徑：「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其他，則脫胎變化多少有別。可知擴大門徑，因包容而浩大，因鎔鑄而創新，能變化處亦當增加，脫胎變化自能有得。資之深，居之安，自然左右逢其源，因此欲求脫胎之法，宜擴大門徑，使變化處多，以求有得。

### 三、因事立體的文體論

惲敬「會通」、「致用」的觀念，亦可由其文體論中看出。在文體論方面，惲敬主張「因事立體」，其目的在於「順時適用」，其原則在於善於通變。通變方法，在於變法得宜，能善加辨體，有助於文章之撰寫。至於文體之戒律，在於不可蹈襲相陳，以免千篇一律。試就「順時適用」、「善於通變」、「變法得宜」諸端，說明「因事立體」之目的、原則與方法。

#### （一）順時適用

惲敬主張「因事立體」，以求文章能「順時適用」，並以「序」體為例說明。〈答蔣松如書〉說：

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為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為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明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sup>25</sup>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25</sup> 惲敬：〈答蔣松如〉，《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52。

以為「序」之淵源，乃「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為人序專集、類集者。」雖然「唐、宋人為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然而每一時代之文章需求不同，因此可因應用之需求，「因事定體，即體成文」，「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否則墨守成規、陳陳相因，致使膠柱鼓瑟，不知變通，則有礙於實用。

又如「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字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序。」但卻有「號為知古文者」，主張「不得作四子書文序」，惲敬則不以為然，以為：「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為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為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偽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sup>26</sup>可知「因事而立體」之目的，在於「順時而適用」。

## （二）善於通變

因事立體的原則，在於善於通變。文章各有體裁，互不相雜。〈與來卿〉說：

至體裁所在，亦不可忽。宋景文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傳之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五經》不同體，百家奮興，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景文此言，誠哉作文之要也。雖然，《易》有《易》之體，《書》有《書》之體，各經皆然，不相雜也，即百家之體，亦不相雜。若一切妄為之，豈可藉口景文之說耶！」<sup>27</sup>

《五經》各不同體，百家亦不同體，並不相雜。故文體有一定矩矱，不可恣意妄為。文體有其體制，不宜任意破壞，以免體卑，惲敬以記體為例說明：

記之體，始于〈禹貢〉，記地之名也；〈考工記〉，記工作之法也；〈坊記〉、〈表記〉、〈樂記〉、〈檀弓〉，記言、記事之法也，其體當辭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是故退之〈畫記〉、〈汴州水門記〉，其正也。子厚〈八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故其體

<sup>26</sup> 惲敬：〈答蔣松如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頁 52。

<sup>27</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 2，頁 216。

卑。<sup>28</sup>

記體的淵源，始於〈禹貢〉、〈考工記〉、〈坊記〉、〈表記〉、〈樂記〉、〈檀弓〉等，「體當詞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為記體之矩矱。以韓、柳文章來說，韓愈〈畫記〉、〈汴州水門記〉，只記其事，並不作論，為記之正體；至於柳宗元〈永州八記〉，「其發也似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則變體為文，「故其體卑」。

至於何謂「通變」？如何通變？惲敬則以人體說明：

譬之橫目縱鼻，穢下潔上者，人也。必橫鼻縱目，潔下穢上，新則新矣！奇則奇矣！恐非復人形也。凌雜之文，何以異是？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sup>29</sup>

文之體，猶人之體，有一定之常理，不可妄為，否則將不倫不類，無以適用。惲敬此說，與劉勰看法有相通處，《文心雕龍·通變》：「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文辭氣力，通變無方，故「詞可新可奇」，是以「數必酌于新聲」。然文章體制，名理相因，有一定常理，故「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謂新奇」，是以「體必資于故實」，不可恣意濫為。惲敬於是提出文章若能「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不傳秘密法也。」<sup>30</sup>可知文體應善於通變，「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

### （三）變法得宜

因事立體的方法，在於變法得宜，如此既能符合文體矩矱，又能「變法中正法」，以順時適用。所謂「因事立體」，即依據文章內容之需求，選擇適當的文體為文。至於文章各體，「其法皆自《史記》、《漢書》來，無他繆巧，不過安放妥當

<sup>28</sup> 惲敬：〈與王廣信書〉，《大雲山房文稿·補編》，頁230。

<sup>29</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6-217。

<sup>30</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7。

而已。」<sup>31</sup>《史記》、《漢書》，涵蓋多種文體，可供參酌，能善於變體，「安放妥當」，則變法有得。惲敬說：

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數大事，視神道碑、廟碑體不同，視墓志銘體亦不同。墓志銘可言情、言小事，表斷不可。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掄揚。墓表必發明實事，故墓表之善最難。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為首尾，文即以之為首尾，而中間櫟括諸事以隔之，此法《史記》、《漢書》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見，韓公偶用之即見，乃才之大小淺深也。<sup>32</sup>

以墓表、神道碑、廟碑、墓志銘各體，體制不同，矩矱亦有不同。「墓表必發明實事」，「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掄揚。」然而有關浙、江二事，因二事自為首尾，故可選用墓表，並參酌《史記》、《漢書》常用之法，亦即「文即以之為首尾，而中間櫟括諸事以隔之」，則可得表法之矩矱，故能善於辨體，有利於為文。

又如記人方面，「僕人只可作小傳」，「不可入書事體，以無大關係也。」<sup>33</sup>至於祠堂，惲敬以為採用「碑銘」體，較之「記」體妥當，其言：

記體謹嚴，唐、宋諸名人，雖破體為之，不過抑揚唱歎，以遠神激蕩而已。氏族官位，既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實載，是以改作祠堂碑銘，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sup>34</sup>

以「記」體作祠堂，即使破體為之，仍有多種限制，如「氏族官位，既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詳載」。然若改用祠堂「碑銘」，則「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如此氏族、官位能詳列，學問、事功可詳載，且利於運筆。又「遞入銘中，可以縱橫往來，使名詞瀏然確然，與碑文相照耀，乃變法中正法也。」<sup>35</sup>惲

<sup>31</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6。

<sup>32</sup> 惲敬：〈與李愛堂〉，《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2。

<sup>33</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6。

<sup>34</sup> 惲敬：〈答伊揚州書三〉，《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2，頁140。

<sup>35</sup> 惲敬：〈答伊揚州書三〉，《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2，頁140。

敬主張文體各有其矩矱，與其破壞體制妄為，不如謹慎選用合宜體制，能夠善於辨體，能「安放妥當」；或「變法中正法」，則有利於行文，並能合於時，利於用。

文體之運用需求變法得宜，切不可蹈襲。但破壞體制雖為文章禁忌，然而蹈襲相陳，更是文體最大戒律，惲敬舉韓愈〈新修滕王閣記〉為例說明。記體主在「記」，並不「論」，但「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開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然而「退之守袁州，不能至洪，故為文不得不如是。」大抵而言，「滕王閣，一也，三王作〈賦〉、〈序〉、〈記〉于前，退之作〈記〉于後，可言者，三王既言之矣，退之恥蹈之，故破壞文體而不顧。」<sup>36</sup>可知蹈襲相陳，甚於破體。文章日新，蹈襲相陳，千篇一律，何文之有？韓愈〈新修滕王閣記〉，破壞文體，以論為記，為不得已之權變，與破壞法度以為新奇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故蹈襲相陳為文章最大戒律，假言規範，卻以蹈襲為功，此不足為文，故「陳陳之惡，甚于破壞」，<sup>37</sup>不可不慎。

#### 四、兼容並蓄的創作論

惲敬「會通」、「致用」的觀念，亦可由其文術論中看出。惲敬為人負氣，重視名節，為學博覽諸子學說，而依歸儒家，並重視致用。惲敬論文有得於畫理，提出「自然天成」之說，反對無有才學，缺乏真情，卻只在形式上下功夫。且重視性情，調節性情與格調二說。同時講求「理實氣充」，使文章內容豐碩，氣勢縱橫，標舉古文正體，須戒除「支、敝、體下」三弊。主張「本末條貫」，既重視學養，又重視性情，強調學文互濟之重要。惲敬之說，既權衡方苞義法之說，去其懦緩之失；又兼取袁枚性靈之說，去其輕浮之弊，具有兼容並蓄、會通致用之特色。

##### （一）自然天成

惲敬主張文章最上乘者，在於「自然天成」。惲敬精通畫理，曾援引畫理來論述文章，以為：

<sup>36</sup> 惲敬：〈與王廣信書〉，《大雲山房文稿·補編》，頁230。

<sup>37</sup> 惲敬：〈與王廣信書〉，《大雲山房文稿·補編》，頁230。



張彥遠《名畫記》曰：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于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者，中品之上；謹細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與謹細之間乎。然《名畫記》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即所謂近今之畫，煥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是也。畫如是，文可知矣。<sup>38</sup>

惲敬以張彥遠品評畫之標準來品評文章，上品列「自然」、「神」、「妙」；中品列「精」、「謹細」；以下者，為「近」，計為六品次，而以「自然者，上品之上」，為最高。可知惲敬以「自然」作為文章的最高境界，在於「神」、「妙」之上；「謹細」以下，列為「近今之畫」，所謂「煥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亦即時人作文之弊病所在。

惲敬主張鍛鍊才學，以學濟文，亦重視性情，主張文章「自然天成」，反對無有才學，徒在形式上下功夫；或缺乏實情，卻矯揉失真，反傷性情，故曰：

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成」，著力雕鑄，便覲面千里，儷體尚然，何況散行？……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為疎闊，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拉雜，及刪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所謂疎古，乃通身枝葉扶疎，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sup>39</sup>

所謂「天成」，乃自然為文，不矯揉造作，著力雕鑄，而自然成文，文章混然一體，形成具生命力之有機體，即使如伯夷、屈原等《列傳》，看似「重疊拉雜，及刪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知《史記》之文，看似繁複，然而法度嚴謹，文章渾然一體，猶若完整之人體，頭顱、骨架、軀體、四肢、血肉、肌膚，項項齊全，即令削去半寸皮毛、肌膚，已傷及人身。

惲敬所謂「自然天成」，與「潔」、「疎闊」、「疎古」相通。惲敬對於「潔」之意涵，與桐城派所謂「雅潔」，不甚相同。惲敬特別援用「疎闊」、「疎古」為釋，亦即「通身枝葉扶疎，氣象渾雅」，著重文章能「混成一體」，為一完整之有機體，

<sup>38</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6。

<sup>39</sup> 惲敬：〈與舒白香〉，《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1，頁199。

而非文字「雅潔」而已，可知「自然天成」的文章，其法度甚為縝密，氣象渾雅。

## （二）文主性情

惲敬重視文章「自然天成」，「混成一體」，與其文主性情的主張相合，文章應為性情之表現，乃作者性情、學養渾然一體之自然表現，亦為作者生命力之呈現。此可由惲敬對魏、晉以來之文學史觀中看出。

第一階段，六朝、隋、唐至宋神宗之時，為「百家微而文集行」時期：自曹魏開始，先有建安文學興起，曹丕、曹植氣體高朗，後繼以正始文學，嵇康、阮籍情識精微，此後文是以性情為文，是以百家衰微而文集盛行。所謂「至若黃初、甘露之間，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嵇康）、嗣宗（阮籍）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為適意，時俗為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為二途。」<sup>40</sup>此一階段，文章以性情為主，文風依人之性情醇、駁而異，然而魏晉之後世風漸趨浮靡，文風亦漸趨頹廢，已不同於三代、兩漢。

第二階段，宋神宗至南宋傾覆，為「文集敝而經義起」時期：此一階段，因前一階段以性情為文，文風趨於輕薄、浮靡，於是宋學大興，改以經義為文，於是以性情為文之魏晉一派衰敗，以經義為文之宋學一派興起。然而學者穿鑿附會，牽強為言；陋儒堆疊為文，文風日漸膚淺，宋神宗之時已是如此，至於宋末，更為嚴重，所謂「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褻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睇而斲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為一物。」<sup>41</sup>此一階段，文章以經義為主，文風依人之入理多、寡而異，但世風輕薄，時師壞經，陋儒誤學，亦不能合於三代、兩漢。

第三階段，元、明至於清初，為「經義散而文集益漓」時期：元、明至於清初，承繼前一階段，以經義為文。劉因、吳澄、方孝孺等人，承繼宋學，經義、文章，尚可勉強維持，之後則日趨下流。所謂「靜修（劉因）、幼清（吳澄）、正學（方孝孺）諸人，自趙宋得理。遞趨遞下，卑冗日積。」<sup>42</sup>此一階段，復以經義為文，然經義較前一階段，更為駢支、偏頗，文風更為膚淺、儒緩，終至經義、文集兩失。

<sup>40</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sup>41</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sup>42</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頁13。

惲敬將魏、晉以來之學術發展，歸納為三階段。一、魏、晉至宋初，文章以「性情」為主，文風依人之性情醇、駁而異；二、宋神宗至南宋傾覆，文章以「經義」為主，文風依人之入理多、寡而異；三、元、明至於清初，「性情」、「經義」兩失，學與文皆淪喪。可知惲敬主張文主性情，但其主張卻與袁枚「性靈說」之主張不相同，惲敬主張「性情」與「經義」融合，亦即注重「性情之醇」與「入理之多」，講求學文互濟，進而渾然而一之生命力之呈現。

惲敬文主性情，著重其真，應有受袁枚「性靈說」影響之處。惲敬與袁枚弟子孫九成交情頗深，惲敬〈孫九成墓誌銘〉即曰：「敬與君無間然，每見君，君必先言子才之美，以拄敬平日之論說。」<sup>43</sup>可知惲敬對於袁枚之說，應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惲敬無所不學，又善於會通，對於袁枚之說，實有所涉獵，並有所修正。〈與黎楷屏〉一文說：

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為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謂「飲私酒，喫瘴死牛肉發聲矣。」<sup>44</sup>

惲敬調和性情與格調之說，剖析性情與格調二者失去其一，皆有所失，強調二者合則得利，偏則兩失，可見其論之會通。可知惲敬之主張，在於「入理」的基礎上求創新，性情與品格並重，性情與學問並重。惲敬與袁枚之說，雖同謂性情，但惲敬亦重視學養，而袁枚較重才氣。惲敬之說，對於袁枚性靈說，過於注重才氣，輕視學問人品所造成的卑薄、輕浮之氣，具有針砭作用。

### （三）理實氣充

惲敬提出自然天成、文主性情之說，但又重視學養，講求「入理」之深，強調學文互濟，故亦主張「理實氣充」，其〈答來卿〉即說：

作文之法，不過理實氣充，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節節為之，不過其心淵然，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放過，故古人之

<sup>43</sup> 惲敬：〈孫九成墓誌銘〉，《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4，頁182。

<sup>44</sup> 惲敬：〈與黎楷屏〉，《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1，頁196。

文，無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掃淨斬絕為之，不過其心超然，於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sup>45</sup>

「理實氣充」為培根固本的要法，欲求「理實」，先須「致知」之功，亦即「讀書窮理」，「多讀書，多作文」，為最根本有效的途徑。至於「致知」，並非枝枝節節為之，而當「其心淵然」，心能淵然，則能容，所謂「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放過，故古人之文，無一意一字苟且也。」誠能如此，所學方能深刻厚實。至於「氣充」，亦即「修性養氣」，先須「寡欲」之功，心才能不為物役，而能修持有得，故「寡欲」非掃淨斬絕為之，而在於「其心超然」，心能超然，則「千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誠能如此，所學才能卓然超俗。

至於「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此亦為「寡欲多思」之修養，則心能淵然、超然，可達於「理實氣充」，「庶幾于斯道」的境界。惲敬以為：

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為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而無為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為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為者亦鮮，則于道易遠；必也有為者亦歸于無為，則庶幾于斯道乎？

46

人若能寡欲，自然可以醇正，無有雜質，不矯揉造作，不刻意作為，自然「於道易近」，而無虛浮、放蕩之弊；人若能多思，必然能夠謹慎，謹嚴深密，不誇蕩虛浮，不放肆邪侈，必然「於道易遠」，而無有拘束、破碎之病。且「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如此能得「道」之廣大浩瀚，又能盡「行」之周密確實，道、行可以合一，才學得以致用；又可以歸於無為，自然能虛懷若谷、謙沖自牧，真能如此，則能理實氣充而達於道。

惲敬主張「理實氣充」，理欲求實而活絡，氣欲求充而順暢，則應戒除支蔓鄙陋、矯揉造作或虛浮卑下之弊病，故特別標榜「古文正體」，應戒除「支、敝、體下」三弊。〈上曹儷笙侍郎書〉即說：「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

<sup>45</sup> 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7。

<sup>46</sup> 惲敬：〈與湯編修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53。

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為容，為容則體下。」<sup>47</sup>「餘」則累贅，容易造成支蔓；「盡」則顯盡，容易造成鄙陋；「容」則矯揉造作，容易造成文體卑下。惲敬並以明代王慎中、歸有光二家為例，加以說明：

蓋遵嚴（王慎中）、震川（歸有光）常有意為古文者也。有意為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為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為之；依附其體而為之，則為支，為敝，為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嚴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為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sup>48</sup>

惲敬以為王慎中、歸有光二家有意為文，且依附古文之體制為文，但因才與學之侷限，而有「支、敝、體下」三弊。王慎中文瞻，用力必過，文章多敝；歸有光文謹，置辭必近，文章多支。且二家文都犯了「為容」之弊，故有「體下」之病。至於清朝，清初三家侯方域、魏禧、汪琬，文章亦各有缺失。所謂：

蓋雪苑（侯方域）、勺庭（魏禧）之失，毗于遵嚴，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峰（汪琬）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sup>49</sup>

自秦、漢文章，歷唐、宋古文家、明代唐宋派，至於清代桐城派，乃一脈相承，然已呈現「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的衰退之勢。而「支、敝、體下」的種種弊病，根源於「薄、瑕、小」，因此欲振興古文，則應「積之而為厚」、「斂之而為堅」、「充之而為大」<sup>50</sup>，亦即應當充實才學，理實氣充，培根固本，才能掃除為文三弊。

<sup>47</sup>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8。

<sup>48</sup>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8。

<sup>49</sup>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8-49。

<sup>50</sup>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9。

至於欲達「理實氣充」，可由窮理、養氣著手，惲敬說：

治之之法，須平日窮理極精，臨文夷然而行，不責理而理附之；平日養氣極壯，臨文沛然而下，不襲氣而氣注之，則細入無倫，大含無際，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矣。<sup>51</sup>

能夠窮理、養氣，至於完全會通融入，至於「不責理而理附之」，「不襲氣而氣注之」，混然一體，自然鮮活，而能「細入無倫，大含無際」，也才能鎔鑄創新，達到「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的境界。至於窮理、養氣之功夫，則可從「看文」、「讀文」著力。惲敬說：

看文可助窮理之功，讀文可發養氣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辭，看其法，看其勢，一一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讀文，則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久則與為一。然非無脫化也，歐公每作文，讀《日者傳》一遍，歐文與《日者傳》，何啻千里，此得讀文三昧矣。<sup>52</sup>

作文與看文雖非完全等同，但若能「一一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則由看文之中，可以修身修性，增廣識見，培養氣度，也可從中學習「意、辭、法、勢」，亦即鍛鍊文章之命意、取材、布局、章法，甚至字詞語勢、文采藻飾等。惲敬並以《史記》為例，說明看書之法，如：

《史記·貨殖列傳》，千頭萬緒，忽敘忽議，讀者幾于入武帝建章宮、煬帝迷樓，然綱領不過「昔者」及「漢興」四字耳。是史公胸次，真如龍伯國人，可塊視三山，杯看五湖矣。此大處看文法也。<sup>53</sup>

此就篇法而言，綱領為全篇脈絡所繫，綱領安排得好，脈絡流轉活躍，文章生動鮮活；綱領若死，筋脈全毀，文章也無法活。看書窮理，所窮之理，何嘗是窮文

<sup>51</sup> 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8。

<sup>52</sup> 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8。

<sup>53</sup> 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8。

以外之理，故學習文法，應可由書中看，書中學。至於讀文之法，應「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久則與為一」。讀文即讀誦吟詠文章，可由音節聲音，推得作者神氣，故能湛浸其中，久而與作者合而為一，至於脫化有得。此與劉大樞所謂「神氣音節」之論，有相通處，可見惲敬主張「學文互濟」，對於桐城派之論，有所接受，有所會通。

#### （四）本末條貫

惲敬重視學文互濟，講求性情之醇與入理之多，重視文章之根柢，於是提出「本末條貫」之說。作文當知其本末，才能界定目標方向。所謂「文之本」，在於作家之修養，惲敬說：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四者，有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于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sup>54</sup>

惲敬以孔、孟之說法，為文章建立標的，以為「辭達而已矣」，但諛辭、淫辭、邪辭、遁辭，則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有如此現象，則不能為「達」。所謂「達」，則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於微者，其辭無不至。」亦即應求「心嚴而慎」，「神暇而愉」，「氣灑然而行」，且「知通於微」，如此心、神、氣、智，皆有所修養，以建立深厚根柢，如此為文，才能達文章「端、和、大、無不至」的境界。故所謂「文之本」，在於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54</sup> 惲敬：〈與劬之論文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6。

作者對於心、神、氣、智之修養。

至於「文之末」，則在文法、修辭等技巧，惲敬說：

蓋猶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脈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為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sup>55</sup>

作文最重要的在於作家之修養，是為「文之本」；而文法、修辭、用字等方法、技巧，則屬「文之末」，根本充盈，使「心、神、氣、智」皆有所修持，自然文章可「端、和、大、無不至」的境界。至於本末條貫之要訣，在於「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氣澄而無滓，得以深厚；質整無裂，有利變化；如此根柢深厚，又能變化無窮，文章自然可雅正浩大，而無所不至。

## 五、取其偏勝的風格論

惲敬在文章風格之要求上，亦呈現「會通」、「致用」之特色。惲敬主張調和醇肆，折衷奇正，與桐城派重視雅潔，講求柔澹清婉的文風，並不相同，對於陽湖派文風之塑立，具有相當貢獻。且惲敬之文章學主張，重視經世致用，故特重陽剛，欲提振陽氣，振興文風，以達救時解弊、文以濟世之決心，故取其偏勝以適變致用。

### （一）提振陽氣

《老子》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陽混成，始能化生萬物，然而陰、陽有所偏頗，陽氣太過或不足，皆會造成弊病。惲敬檢視明、清散文，即以陽氣之太過與不足，提出「槍棊氣」和「袍袖氣」之說，〈與舒白香〉說：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55</sup> 惲敬：〈與劬之論文書〉，《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頁46-47。



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棊氣重；歸熙甫、汪荅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裨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徑。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sup>56</sup>

惲敬將明、清古文之弊病，概括為「槍棊氣」和「袍袖氣」兩類。「槍棊氣」指文章局而促，急而銳，失去蘊蓄之美，其弊在於陽氣「太過」，此種弊病起源於三蘇，形成於王慎中，至清侯方域、魏禧尤為突出。「袍袖氣」指文章餘而支，緩而弱，失去剛健之風，其弊在於陽氣「不足」，此種弊病起於歐陽修，形成於歸有光，至清汪琬和桐城派，尤為突顯。可知惲敬對於文章陽氣過剩，至於「局而促，急而銳」的「槍棊氣」，以為弊病；然對於文章陽氣不足，至於「餘而支，緩而弱」的「袍袖氣」，亦以為病痛。故調和陰陽，關鍵在於陽氣之提振、調節，使之合度，避免陽氣之太過與不足，此一見解與其「自然天成」之說，講求文氣渾然一體的主張相合，然而就陰陽剛柔之風格論而言，惲敬所論文章風格，則傾向陽剛。

惲敬既主張「文主性情」，又主張「理充氣實」，調和「性情」與「學養」，故惲敬特別重視「性靈氣魄」四字，曾勉勵其婿來卿，以為：

至古文之訣，歐陽文忠公已言之，曰：多讀書，多作文耳。然必有性靈、有氣魄之人，方能語小則直湊單微，語大則推倒豪傑。本源穢者，文不能淨；本源粗者，文不能細；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吾婿于「性靈氣魄」四字上，均不讓人，勉之！勉之！在有恆而已。<sup>57</sup>

惲敬所謂性情，即作者生命力渾然一體之呈現，亦即文章之本源，尤其性靈、氣魄二者為要，缺乏性靈、氣魄，致使本源汙穢、粗俗、狹小，則文章就不能潔淨、細緻、浩大，故惲敬「文主性情」之觀點，實與其「自然天成」之說相互應合，可互為印證。且與其提振陽氣，講求醇肆調和，特重陽剛之風格論相呼應，為完

<sup>56</sup> 惲敬：〈與舒白香〉，《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1，頁200。

<sup>57</sup> 惲敬：〈與來卿〉，《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2，頁216。

整之理論體系。

## （二）調和醇肆

惲敬為文重視會通、致用，依據其對於「槍棊氣」和「袍袖氣」之針砭，可知其對文章風格之要求，則在於提振陽氣，揉合陰陽，具陽剛傾向。而惲敬的文章，筆力雄勁，縱厲多氣，亦偏向陽剛，與其所論相符合。吳德旋以為：「子居文有得於遷、固之雄剛，然頗似法家言，少儒者氣象，〈上秦小峴按察書〉乃絕似《戰國策》，唐以後如此等文甚少也。」<sup>58</sup>「惲子居得之以言儒者，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邈、溫純之美。」<sup>59</sup> 吳德旋之說，以桐城派優柔澹邈之風格，與惲敬之雄爽精健對比，可見惲敬文章與桐城派不同之處。吳氏又說：

或謂子居文似毛西河，予以為西河冗雜，子居高簡有法，相懸不可以階級計，但詞氣特相近耳。然使子居和其氣，婉其詞，其文未必能若是之雄且傑也。使子居和其氣、婉其詞，而其文能若是之雄且傑，不且將差肩於子長、退之，而陵轡孟堅子厚矣乎！<sup>60</sup>

可知吳氏以為惲敬之文，「高簡有法」，文章能「雄且傑」，倘若其文「和其氣，婉其詞」，則「未必能若是之雄且傑」。大抵而言，文章欲「和其氣，婉其詞」，則難以奇肆，文章欲「調和醇肆」，則不能無「奇肆」，揉合陰陽，則應調節陽氣使能得其中，亦即調和奇肆，使不猛爆粗劣，產生「槍棊氣」之弊，而不違背「醇正」之旨趣。惲敬以《史記》作為習文範本，《史記》文章雄深雅健，文風偏於陽剛，惲敬文章亦如此，故惲敬文章風格與其「醇肆調和」之主張相稱。

若與「奇正」之立場而論，張維屏以為：「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間者，則惲子居也。諸家為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于《史記》。夫善學古人者，非徒學其形貌，貴得其神氣也。叔子、子居之文于《史記》，未嘗貌似，而吾謂其善學《史記》者，

<sup>58</sup> 吳德旋：〈與程子香論大雲山房文稿書〉，《初月樓古文鈔》，卷2，頁18上。

<sup>59</sup> 吳德旋：〈書大雲山房文稿一〉，《初月樓文鈔》，卷1，頁8下。

<sup>60</sup> 吳德旋：〈書大雲山房文稿一〉，《初月樓文鈔》，卷1，頁18上。

謂其得《史記》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sup>61</sup>可知惲敬文章「介乎奇、正之間者」，與其「醇肆調和」之主張相合。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則援劉師培《左盦外集·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以為惲敬文章風格「峻拔」，乃「介乎奇、正之間」：

作為一個意象性的評語，「峻拔」往往相對於謹細、柔婉而言，因而近於奇妙、陽剛之文。不過，若從奇與正的關係的角度來看，「峻拔」則是介乎奇、正之間的一種風格，即平正而不窳弱，雄奇而不恣肆。<sup>62</sup>

惲敬古文風格介於奇、正之間，能調和醇肆，與桐城派雅潔風格不同，對於陽湖派文風之建立，具有相當影響。

### （三）特重陽剛

惲敬所謂「醇肆調和」，實則提振陽氣，調節奇肆，使陰陽得以合一、醇肆得以調和，故其風格之說，本傾向陽剛，不同於桐城派之陰柔取向。惲敬、張惠言二人古文，乃透過王灼等人，間接得之於劉大櫟。但惲、張二人之學與文，皆有別於桐城諸家。桐城派從唐宋八大家入手，取徑於歸有光，以閒情眇狀為姿媚，以紆徐搖曳為神氣，得陰柔之美，清順有餘而精彩不足。惲敬治古文，由諸子百家入手，得力於韓非、李斯，屬辭瑰偉、聲情並茂，得陽剛之美，一偏向陰柔，一偏於陽剛，二者持論亦有差別。惲敬對於桐城三祖文章，則有所評論，〈上舉主笠凡先生書〉以為：

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為最，下筆疎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再傳為劉海峯，變而為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為姚姬傳，變而為淵雅，其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sup>63</sup>

惲敬評論桐城派三祖，以為方苞為最，姚鼐次之，海峯居下，並以為海峯「識卑且邊幅未化」；且以為三家風格，方苞「疎樸」，海峯「清宕」，姚鼐「淵雅」，三

<sup>61</sup> 張維屏：《聽松廬文鈔》，引自《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234。

<sup>62</sup> 曹虹：〈「平生才學沛然文外」的惲敬古文〉，《陽湖文派研究》，第五章，頁 185。

<sup>63</sup> 惲敬：〈上舉主笠凡先生書〉，《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 2，頁 137。

家雖各有特色，但皆傾向於「雅潔」。又〈與章澧南〉則以為海峯文章，「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銳于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疎樸不及；才有餘于弟子姚姬傳先生矣。」且「海峯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非真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sup>64</sup>

惲敬對於桐城三祖之文，不無微言，主要之原因，在於其對於文章風格之要求，在於醇肆調和，文章介乎奇、正之間，與桐城三祖之文「柔澹清婉」，並不相合。吳仲倫即言：「子居為文，氣必雄厲，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僕所深好者，柔澹之思，蕭束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此數者皆子居所少。」<sup>65</sup>吳氏師法桐城姚鼐，文章風格趨於桐城，其所深好者，為桐城派「柔澹清婉」的文章風格，有別於惲敬之「雄爽精健」，可見惲敬之文風與桐城派不同，其對文章風格之要求，亦與桐城有別，故自嘉、道以後，即有「姚惲派分」之說，肯定惲敬古文之地位。惲敬對於清代古文傳統的拓展，頗富時代意義；而對於陽湖派之崛起，其功不可沒。

## 六、結論

惲敬「會通」、「致用」的文章學主張，不只對於陽湖派有開闢之功，對於近代「經世致用」、「會通鑄鑄」思潮之產生，亦具引導啟迪的作用。陳連營於〈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一文即說：

論及清代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學者們一般把賀長齡、魏源等人編纂《皇朝經世文編》作為其興起的標誌，似乎是說經世思潮興起於道光年間。而實際上，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肇始於清王朝由盛轉衰的乾、嘉之際，當時即有一批關注時事、潛心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者，首開議政風氣的是洪亮吉、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一批常州學派的官僚知識份子。他們觀察社會現實之敏感，認識問題之深刻，涉及領域之寬廣，完全

<sup>64</sup> 惲敬：〈與章澧南〉，《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1，頁205。

<sup>65</sup> 吳德旋：〈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稿書〉，《初月樓文鈔》，卷2，頁19上。

可與他們的後來人、廣受後人讚譽的思想家龔自珍、魏源等人相比肩。<sup>66</sup>

在文學思想方面，惲敬主張會通諸學，尤其諸子百家之學，以為學術發展如此，欲振衰起敝，以文濟世，則應參之百家，並折之於六藝，所謂「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sup>67</sup>博覽百家，應折衷六藝，善加會通，誠能如此，不只有益於經學、諸子之學，也有助於創作，具有救時解弊，文以濟世的作用。在文體觀念方面，文章不管以性情為文，或以經義為文，文體皆有一定矩矱、常理，不可妄為，然文章為性情之表現，亦為載道之良方。性情講求真，不可盜襲相陳；文章既為載道之工具，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更不可千篇一律，故盜襲相陳，為文體之最大戒律。文體者，因事立體，順時適用，要知所變通，變法得宜，由此亦可見惲敬會通、致用之精神。

在創作理論方面，惲敬歸納魏、晉以來文章之發展，大分為二，一者以性情為文，文章因人性情之醇、駁而異，世風浮靡、詭誕，文風亦隨之浮誇、頹廢；二以經義為文，文章因人體道之多、寡而異，經義駢支、偏頗，文風亦隨之膚淺、懦緩。故欲救時解弊，以避免浮誇、頹廢之弊，惲敬主張文以性情為主，講求文章之真，能善於培養性靈、氣魄，並持之以恆，可使文章「氣象渾雅」，「自然天成」。又為避免駢支、偏頗之病，主張「窮理寡欲」，「理實氣充」，使文章能雄深雅健，縱橫多氣。若能善於培養性靈、氣魄，又能理實氣充，則能「本末條貫」，免於「支、敝、體下」三弊。

在風格要求方面，惲敬主張「醇肆調和，出入奇正」之文，取法六朝辭賦、駢體，鎔鑄諸子百家，而折衷六藝。《清國史·文苑傳》以為：「論者謂國朝文氣之奇推魏禧，文體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間者惟惲敬。苞之文，學者尊為桐城派。至敬出，學者乃別稱為陽湖派云。」惲敬文章介乎奇、正之中，與桐城柔澹清婉文風有別，對於陽湖派文風之建立有相當影響；對於桐城派文風「袍袖氣」重，有餘支、懦緩之弊，具針砭效用。

時代動盪之刺激，促成陽湖派經世致用思想之興起，也促成近代思潮之形成，陽湖派可謂近代思潮的先聲，對於近代思潮之形成，具有催化與引導的功能。惲

<sup>66</sup> 陳連營：〈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4月），第四輯。

<sup>67</sup> 惲敬：〈敘錄〉，《大雲山房文稿·二集》，頁13。

敬為陽湖派開創者之一，其文章學之產生，即來自於時代變動之激盪，為達到「經世致用」、「以文濟世」之目標，故會通諸學，折衷六藝。在經學方面，歸本孔聖，取徑孟子，調和漢、宋；在史學方面，按經驗史，以史翼經，融會經、史，以利致用；在子學方面，會通百家，由博反約；在文章取徑方面，會通辭賦，兼重駢散；在創作理論方面，兼重性情與經義，調和窮理與性靈，提出「本末條貫」之說。在文章風格方面，以「自然天成」、「渾然一體」的觀念，揉合陰陽，調和醇肆，出入奇正。可知惲敬真是善於會通，善於致用。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東漢·班固撰，清·王先謙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出版社，2013年。
- 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月。
-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11月。
- 清·惲敬：《惲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
- 清·張惠言：《茗柯文》，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11月。
- 清·張惠言：《茗柯文補編》，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79年。
- 清·吳德旋：《初月樓古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 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 清·劉逢祿：《劉禮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2月第3版。
-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

### 二、近人論著：

- 王更生：《文心雕龍管窺》，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5月。
- 朱任生：《姚曾論文精要類徵》，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吳建福：《惲敬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4月。
- 承載：〈李兆洛與常州今文經學〉，《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5月，頁431-460。

-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曹 虹：〈在清代駢散並興的接點上再談陽湖派的性質與風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3期。
- 曹 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0月。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8月。
- 陳其泰：〈劉逢祿對公羊學說的出色建樹〉，《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5期。
- 陳連營：〈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興起〉，《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4月，第四輯。
- 彭明輝：〈今文學的復興及其變奏〉，《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63-112。
- 楊旭輝：《陽湖文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 盧鳴東：〈張惠言虞氏易禮中的公羊思想〉，《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臺北：學生書局，2009年5月，頁367-402。
-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附一《清代文學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